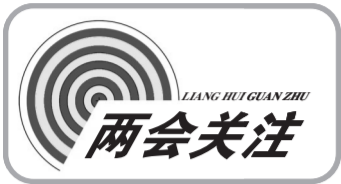


激发治污活力 增强治污动力

全国人大代表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吕望舒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文件。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2017年6月,国务院批复江西等5省份的部分地区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我国已逐渐构建起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绿色金融体系。

然而,从总体来看,我国绿色金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基础性工作还需完善。全国两会期间,如何用经济手段激发治污活力,增强治污动力,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们关注的话题。

做好基础工作,加快绿色金融标准化和制度化建设

“为促进绿色金融对绿色发展作用的发挥,应尽快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建立绿色金融整合统计制度和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做好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张智富建议。

在张智富看来,当前我国推进绿色金融尚有3项难点有待突破。首先是绿色金融界定标准不明确,绿色定义与国际公认的绿色定义存在差异。其次

是绿色金融统计体系不完善,覆盖范围窄、统计内容仍待补充。此外,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意识有待引导也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对江西省全省33家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显示,66.67%的金融机构认为“绿色金融标准不明确”制约了绿色金融的推进。为此,张智富建议,加快绿色金融

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标准化国际统筹协调力度,加快启动成立跨部委的绿色金融标准化工作组,负责绿色金融标准化的组织和协调。

同时,他也表示,完善绿色金融基础制度安排,还应从激励和约束两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使绿色投融资活动的正外部性和污染投融资活动的负外部性内化为投资决策的收益和成本,从而起到激励绿色发展、约束污染投资的作用。

加快绿色金融改革试点,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

绿色金融试点,是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的现实需求,对于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与创新潜能,实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与金融业自身发展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以安徽省为例,截至2017年年末,安徽省绿色信贷余额达1700亿元,较年初增加近3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高于全部贷款增速3.7个百分点。

安徽代表团《关于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议》中写道:“特别是

合肥市具备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业优势、生态环境优势、地理区位优势 and 特色产业优势,具有申报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良好基础。”

代表团同时建议,国家支持合肥市申报试验区,应按照“改革创新、服务发展、先行先试、风险可控”的原则,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完善绿色信贷机制,深化产品和服务创新,强化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加强绿色金融开放合作,构建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也表示,应适时扩大绿色金融改革试点范围。他建议,在第一批绿色金融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将江苏等更多区域纳入试点范围,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参与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积极性,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有机衔接和合力。

同时,建立完善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鼓励上市公司积极主动进行信息披露。

完善环责强制险制度,提升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相比绿色金融的其他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在我国发展较为缓慢,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险种属于商业保险,企业投保意愿不高。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配套政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资深经理周燕芳表示。

周燕芳介绍,截至2016年,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已覆盖30多个地区,涉及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等多个领域。虽然覆盖面不低,但发展水平却不高。2016年,全国投保企业仅1.44

万家次,保费收入仅2.84亿元,同比增长3.9%。保险公司共提供风险保障金263.73亿元,同比增长8%,各项指标均远低于保险行业整体增速,在整个财产险市场所占比重连0.1%都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缺乏强制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的法规,污染企业违法成本较低和财税支持力度不足,被周燕芳认为是影响其发展的政策因素。而在市场主体方面,她认为影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的因素也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经营主体准入缺乏专门标准;二是费率厘定缺乏足够的基础数

据;三是缺乏健全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价机构。

从我国部分地区实践来看,已经有部分地区的试点效果明显,如云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福建省等地。周燕芳表示,可以借鉴国际及地方实践,建立环责强制险制度,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针对环境高风险行业实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并适时向其他行业推广。同时,要优化地方政府在环责险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在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的同时,加强环保部门与保险行业的沟通与合作。



今年全国两会,余国东带来了《关于加大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支持力度的建议》,希望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对重庆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本报记者邓佳摄

◆本报记者王琳琳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是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全国水资源战略储备库和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关重庆长远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如何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实现“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环保局副局长余国东有着自己的思考。全国两会期间,余国东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谈责任

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关长远,我们责无旁贷

“重庆库区内长江流程679公里,三峡库区重庆段300亿立方米水(全库区393亿立方米)。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其水、土、大气、生态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对长江中下游都会产生敏感的反应和影响,我们必须保护好长江上游生态环境。”谈及对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认识,余国东向记者表示。

余国东强调,重庆的长远发展也与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息息相关,“生态环境安全是实现重庆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蓄势。”

为此,近年来,重庆环保部门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宏观优化空间布局,按期完成国家总量减排任务,大力实施生态环保搬迁,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同时,抓好规划环评,严格落实产业禁投清单、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助推产业发展方式转变。

2017年,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500.27亿元。与此同时,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为优,纳入国家考核的42个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0.5%(国家任务85.7%),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我们要的是质量更优,效益更好的发展。”余国东说。

■谈压力

库区存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谈及压力,余国东表示,一方面来源于能不能保护好三峡库区、建设好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压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库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三峡库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是长江经济带中典型的经济低谷区、贫困区县集中连片。

近年来,为了保护三峡库区,重庆更是以“三线一单”宏观优化生态空间布局,严格执行主体功能区战略。在渝东北万州经济开发区实施“生态功能差异化”发展和环境政策,在三峡库区执行严格的产业准入政策和环境政策。

也正因为此,库区周围很难靠自身原始积累获得初步发展基础,低污染、高产出的产业又向周边大城市集聚,“马太效应”明显。

全国两会前,余国东曾专门前往库区调研。他发现,三峡库区开工建设时,三峡库区第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39:35:26;移民搬迁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有所提升,但层次仍然较低,对库区自身原材料和基础性产业依赖过大,深加工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难以实现自我循环增长。

“2017年,三峡库区8个库区重点移民区县66%的财政支出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库区经济社会发展不足的态势还在进一步加剧。”余国东说。

■谈建议

希望加大主体功能区转移支持力度

带着调研的成果,此次全国两会,余国东带来了《关于加大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支持力度的建议》,希望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对重庆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环保局副局长余国东

为了说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必要性,余国东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2017年,为了保护库区水环境质量安全,重庆市做成了一件其他省份都没有做到的事,那就是投入数十亿元资金,在库区周围1584个建制乡镇全面规划污水处理设施,去年年底已经全部建设完成。

“虽然污水处理设施已经有了,但目前还有6000公里左右的二、三级管网没有建完,假如按修1公里100万元计算,起码还需要六七十亿元。仅靠当地政府的资金实力,难以满足需求。”谈起建设资金,这位主管财务的副局长条理清晰地分析道。

因此,余国东呼吁,《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重庆市涉及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或重要生态功能区的16个区县应分批纳入转移支付范围。同时,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将重庆纳入2018年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指导支持重庆与邻近省份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大对重庆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奖励力度。

“在国家的支持下,在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重庆一定会坚决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余国东说。



全国政协委员蒋和生建议

精准划定红树林保护区

本报记者王琳琳3月12日北京报道 当前,我国红树林保护区存在边界不清、权责不明、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为加强红树林保护,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全国政协委员蒋和生建议,加快精准划定我国6个国家红树林保护区保护范围。

蒋和生认为,国务院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快精准划定国家级红树林保护区界线,既有利于依法解决保护区界线问题,也可以缓解保护区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直接矛盾。比如将居民聚集区的道路和建筑物等调整出保护区范围,保障保护区内社区群众的生活来源。

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效缓解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的矛盾。

蒋和生建议:一是加快完成红树林保护区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推进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将区域内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管理、位置重叠的保护区统一为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全部由国务院统一管理。同时,国家财政支持国家级红树林保护区建设,改变保护区靠地方财政吃饭的尴尬境地,以便毫无后顾之忧地履行保护职责。

二是探索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本着“谁受益,谁补偿”和“服务于社会、取之于社会”的原则,建立起自我补偿、社会补偿和国家补偿的多层次补偿的生态补偿体系和运行机制。探索在保护区实施政府购买生态服务产品的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

三是进一步理顺自然保护区管理的体制机制。机构和人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根本和基础,建议由国务院统一协调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6个国家红树林保护区的机构、人员编制及经费来源问题。



扩建海稍水库是实施“兴水强滇”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云南省水安全保障网的重要支撑。

杨晓雪代表



加快精准划定国家级红树林保护区界线,既有利于依法解决保护区界线问题,也可以缓解保护区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直接矛盾。

蒋和生委员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把虐待动物罪写入刑法,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朱列玉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雪建议

贫困县水库扩建需支持

本报记者吕望舒3月12日北京报道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是云南省降雨量最少的地区之一,资源性缺水与工程性缺水并存,水资源匮乏已成为制约全县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正因此,位于宾川县的海稍水库扩建工作就更为重要。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环境监测站技术管理室主任、副总工杨晓雪表示,扩建海稍水库是实施“兴水强滇”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云南省水安全保障网的重要支撑。

杨晓雪告诉记者,近年来,海稍水库扩建工程各项前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但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宾川海稍水库扩建工程属重要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规模、工程量及资金需求较大,州县财政靠自身财力没有能力实施海稍水库扩建工程,需要国家给予大力支持。

杨晓雪建议,为确保宾川海稍水库扩建项目尽快实施并投入使用,有效缓解宾川县水资源供需矛盾,彻底改变宾川干旱缺水的现状,减轻洱海供水压力,促进洱海保护和生态修复,国家相关部委应将宾川海稍水库扩建工程列入2018年中央投资计划,给予大力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

将虐待动物罪写入刑法

本报记者王琳琳3月12日北京报道 近年来,一些虐待虐杀动物的案例频发,已经演化成危害社会秩序的恶性事件,但是我国刑法中并未将虐待动物的行为列为刑事犯罪,无法对虐杀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与遏制。为更加有效地约束和遏制虐待动物,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尽快将虐待动物罪写入刑法。

朱列玉认为,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把虐待动物罪写入刑法,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出台了有关反虐待动物的法案。而在国内,对于野生动物以外的工作动物、经济动物、娱乐动物等都没有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即便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单纯的虐待行为也并不构成犯罪。

朱列玉表示,出于对传染病防疫的需要,也应对虐待动物的行为进行刑事法律规制。有学者研究表明,虐待动物的行为更加容易引起传染病的交叉感染和扩散传播。尤其是在装卸和长途运输中,在动物密集的空间内对动物进行殴打和虐待,极易引起动物流行传染病的传播和交叉感染,甚至可能产生作用于人的传染性疾病。因此,将虐待动物罪写入刑法不仅是出于对动物保护本身的考虑,同时也是出于对人类自身安全的考虑。



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近日提交了《关于打造现代流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等3份提案,刘强东认为适应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需要大力发展更加开放、高效、智能、绿色的高质量现代流通体系。本报记者邓佳摄